

【第一辑】

安大史学

吴春梅 / 主编

- ◆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
- ◆ 历史文献研究
- ◆ 中国古代史研究
- ◆ 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 ◆ 淮河流域研究
- ◆ 世界史研究

安徽大学出版社

A
N
D
A
S
H
I
X
U
E



A N D A S H I X U E

ISBN 7-81052-870-X



9 787810 528702 >

ISBN 7-81052-870-X/K · 63

定价 25.00元

第一辑

安大史学

顾问 瞿林东

主编 吴春梅

编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鑫义 卞利 刘信芳 汤奇学

李修松 何琳仪 张子侠 张金铤

陆勤毅 吴春梅 周怀宇 周致元

徐国利

本辑执行编委 张金铤 张子侠

安徽大学出版社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安大史学·第一辑 / 吴春梅主编. — 合肥: 安徽大学出版社, 2004.7

ISBN 7-81052-870-X

I. 安... II. 吴... III. 史学-文集 IV. K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75391 号

安大史学·第一辑

吴春梅 主编

出版发行	安徽大学出版社 (合肥市肥西路3号 邮编 230039)	经销	新华书店
联系电话	总编室 0551-5107719 发行部 0551-5107784	印刷	合肥创新彩印厂
电子信箱	ahdxchps@mail.hf.ah.cn	开本	787×960 1/16
责任编辑	朱寒冬	印张	24
封面设计	孟献辉	字数	440千
		版次	2004年7月第1版
		印次	2004年7月第1次印刷

ISBN 7-81052-870-X/K·63

定价 25.00 元

如有影响阅读的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卷首语

历史学是研究和阐述人类社会发展过程及其规律的学科。没有历史科学,也就没有社会科学。历史学的社会功能不仅在于传授知识,提高文化素养,培养道德情操,增强民族自信心、自豪感和历史责任感,还在于探索规律,观察未来。历史记载有奔腾的生命存在,能让人们鉴古知今、了解今日现实状况之所由来;历史记载中闪耀着的智慧之光,可使人们避免前车之覆辙,认清未来的方向,作出正确决断和制订合理发展规划。“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借鉴前人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建设中,历史科学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二十一世纪是一个充满机遇与挑战的时代。突飞猛进的科学技术带来社会面貌日新月异的变化。国际风云变幻难测,各种矛盾纷至沓来;国内建设也面临不断出现的新课题,越来越多的问题亟待思考和解决。作为人文科学基础的历史学,探索规律和取得借鉴是其基本任务,迫切需要不断加强以适应复杂多变的形势。本着推进历史研究、扩大学术交流和“以史为鉴”的基本精神,安徽大学历史系经过长期酝酿和充分准备,在各方面支持和鼓励下,创办学术性年刊《安大史学》。“年刊”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刊载各类史学论文,为大家提供一个发表研究成果的园地,借以加强学科与学术队伍建设,促进新生学术力量成长,推动历史研究向前发展。

安徽大学历史系始建于1958年,重建于1979年。恢复建系以来,我们加强学术队伍建设,重视对外学术交流,大力引进高层次人才,学科建设发展迅速,逐渐形成一支政治素质好、专业能力强、年龄

2 安大史学

结构比较合理、锐意进取的师资队伍。目前我系拥有历史学、考古学两个本科专业,专门史、历史文献学、经济史、史学理论与史学史、考古与博物馆学等五个硕士学位授权点,2003年,我系“历史文献学”专业又成为博士学位授权点。我系科研力量也得到加强,研究领域不断拓展,显示出自身的特色和优势,特别是在历史文献(含古文字学)、淮河流域历史文化、徽学、区域经济史、近代安徽人物研究方面都有相当的成就,引起学术界的重视。目前我系承担了多项国家、省部级科研项目,出版学术专著二十余部,其中不少著作得到广泛的好评。

历史研究,任重道远。我系历史学专业起步较晚,与国内著名高校相比,存在明显的差距和不足。我们将进一步更新观念,抓住机遇,开拓进取,提高整体科研水平,培养更多高质量的研究人才,努力使学科建设更上一个台阶。我们创办《安大史学》,旨在扩大学术交流,推进史学理论建设,把历史、现实和未来有机地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史学的社会功能和“殷鉴”作用。我们诚恳地期待着学术界专家、同仁惠赐大作,并对《安大史学》的建设提供宝贵意见。

本期《安大史学》刊出论文三十八篇,根据论文内容和相对集中的主题,本期分为“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历史文献研究”、“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淮河流域研究”、“世界史研究”六个方面。论文作者既有年高德劭的资深教授,也有朝气蓬勃的青年教师。尽管论文水平参差不齐,但大多有自己的观点或者独到的见解。本期选刊了我系主办“新世纪历史文献学前沿论坛”的部分论文,与会专家这些论文为本刊增色不少。我们谨向这些专家表示深切的感谢。我们还要感谢安徽大学“211”工程基金给予的出版资助,感谢安徽大学出版社对我们工作的大力支持。

《安大史学》是学术百花园中的一棵小草,一株嫩芽,需要史学界同仁的精心呵护。让我们大家共同努力,办好《安大史学》,为史学的发展和繁荣贡献一分力量。

吴春梅

2004年7月

目 录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

- 瞿林东 探索建设史学理论的道路 / 1
赵生群 司马迁行年新考 / 15
王鑫义 关于《史记》“体圆用神”特点的领悟 / 24
高 敏 《〈南北史〉撮琐》序 / 35
傅玉璋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述论 / 48
张子侠 评明清两代正史编修的得与失 / 56
徐国利 钱穆的圣贤史观 / 70

·历史文献研究·

- 何琳仪、程燕 释“庀” / 80
熊铁基 重新认识古书辨疑 / 86
张国刚 柏林德国图书馆中国古文献调查记 / 91
陈得芝 浅论边疆民族历史文献学的建设 / 100
董志翘 关于重要佛教史籍《高僧传》的重新校理 / 105
黄 征 敦煌文献残卷 Dx03776、Dx04019 + Dx04021 考证 / 114
范金民 太湖厅档案及其史料价值 / 121
王天根 梁启超与《天演论》稿本的传播 / 133
黄敏学 中国古代音乐文献的分类及其特征 / 144

·中国古代史研究·

- 李修松 夏商周时期自然环境研究 / 155

2 安大史学

- 孟祥才 论近年来地方史研究蓬勃发展的意义 / 172
胡秋银 稽康退隐的思想根源 / 175
[日]远藤隆俊 日本宋代宗教史研究的现状与课题 / 184
赵华富 论大蒙古国对外战争胜利的决定性因素 / 197
张金铤 圆署体制与元代地方吏治 / 215
周致元 陈奉乱楚述论 / 221
[日]吉尾宽 崇祯八年颍州太和县防卫体制透视 / 230

·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 吴春梅 从“民立宪政”到“宪政立民” / 244
陆发春 论胡适“好政府主义”思想的缘起与流变 / 253
梅立乔 试论胡适的人生哲学 / 263
朱正业 试析庚子赔款的“退还”与使用 / 270

·淮河流域研究·

- 周崇云 淮河流域史前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基础 / 278
方成军 简论淮河流域西汉王侯墓随葬礼俗 / 289
周怀宇 隋唐地理学的进步与两淮交通的开发 / 296
梅兴柱 明代淮河的水患及治理得失 / 306
蒲霞 论清代长期淮河流域(安徽段)的垦殖活动及其影响 / 316

·世界史研究·

- 张本英 经济霸权与非正式英帝国 / 322
周乾 论 1896~1899 年日本对华政策 / 331
蒋浙安 论二战期间太平洋战区美军潜艇部队的地位 / 352
吴文武 从计划到撤销援建阿斯旺高坝看美国的外援政策 / 359
龙宏甫 英法政治现代化殊途同归的历史考察 / 373

•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 •

探索建设史学理论的道路

——谈谈《史学要论》和《国史要义》的启示

瞿林东

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史学在理论上的探讨和建设方面,可谓披荆斩棘,走过了一段艰苦的路程,所出版的著作约有二十余种^[1],论者迭起,各骋其说。其中,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及《补编》,主要探讨史学方法论方面的问题;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主要探讨历史理论方面的问题;李大钊的《史学要论》和柳诒徵的《国史要义》,主要探讨史学理论方面的问题。经过半个世纪以上的时间的检验,这几种著作因其特色鲜明,有更长久的生命力和更突出的理论参考价值。

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是李大钊的《史学要论》和柳诒徵的《国史要义》在史学理论建设方面所作的努力及其留给后人的启示。

一、以“史学”为主要研究对象

李大钊的《史学要论》和柳诒徵的《国史要义》都有明确的撰述宗旨,即以“史学”为研究对象。李著十分强调地指出“历史”与“历史学”(即“史学”)的区别,而本书乃以“史学”名书,所论对象自然极为鲜明。柳著虽然没有交待这种区别,但所论“国史”之“要义”,其“义”亦在于“史学”无疑;论者把《国史要义》誉为刘知几《史通》、章学诚《文史通义》之后的巨制^[2],也正道明了此书的性质。

《史学要论》和《国史要义》在研究对象上是一致的,但它们的话语和概念却甚为殊异。《史学要论》不论在概念使用上,还是语言表述上,都反映出“五四”新文化时代的气息,反映出在多种近代学科产生后史学的性质和作用的重新定位。

2 李大钊

它提出了“什么是历史”、“什么是历史学”、“历史学的系统”、“史学在科学中的位置”、“史学与其相关学科的关系”、“现代史学的研究及于人生态度的影响”等问题。作者在阐述和论证这些问题的时候,字里行间,渗透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深刻性和辩证色彩。

《国史要义》的作者,自然也有其所处时代之学术前驱的修养,但在讨论“国史”的“要义”时,则沿用传统的话语和概念(其中包括在传统概念的框架下提出来的新概念)。他所讨论的问题是“史原”、“史权”、“史统”、“史联”、“史德”、“史识”、“史义”、“史例”、“史述”、“史化”等。其中,“史德”、“史识”、“史义”、“史例”是古代史家已经提出过的,其余则是作者新提出来的,而其内涵和样式都颇近于传统的风格。

这里,我们或许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都有中西文化交会背景和中西学术修养的李大钊、柳诒徵^[3],为什么在史学理论的探索上,竟然会有如此的差异?依我的肤浅认识,这是因为:李大钊的《史学要论》着眼于探索一般意义即普遍意义上的史学理论体系,故其话语、视野、概念等,均须与此目标相一致、相协调。《史学要论》一书除第四章外,多系论述,少有征引,正是这一特点的反映。而柳诒徵的《国史要义》则不然,他所要讨论的,主要是“国史”的“要义”,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史学”的“要义”,此其一;其二,《国史要义》的撰述宗旨在继承和发扬中国古代史家在史学理论上的创造,并使之获得新的生命力。对此,柳诒徵在《国史要义·题辞》中有所说明,他写道:

漂泊西南,窃禄国校,无以昭士,爰为是书。钩稽群言,穿穴二民,根核六艺,渊源《官》、《礼》。发皇迂、固,踵躐刘、章,下逮明清,旁览域外。扶摭政术,评鹭学林,返溯古初,推暨来叶。

《史记》、《汉书》的传统和《史通》、《文史通义》的成就是作者十分关注的。上溯于礼书,这是作者考察史学的一个特点;旁览域外,这是作者撰述此书的学术环境与学术视野。当然,作者的撰述宗旨是极明确的,即“返溯古初,推暨来叶”。概而言之,作者的目的是在刘知几、章学诚史学理论成就的基础上,总结过往,开拓未来。

显然,要探讨“国史”的“要义”,即“中国史书”或“中国史学”的“要义”,当必须从研究刘知几《史通》、章学诚《文史通义》开始。刘知几自谓《史通》一书之义说:

盖伤当时载笔之士,其义不纯。思欲辨其指归,殚其体统。夫其书虽以史为主,而余波所及,上穷王道,下揆人伦,总括万殊,包吞千有。

自《法言》已降，迄于《文心》而往，固以纳诸胸中，曾不蕪芥者矣。……夫其为义也，有与夺焉，有褒贬焉，有警戒焉，有讽刺焉。其为贯穿者深矣，其为网罗者密矣，其为发明者多矣。^[5]

《史通》问世后，时贤评论说：“为史氏者宜置此于座右。”^[6]《史通》含内、外篇凡52篇，存49篇，佚3篇而仅存其目。这是中国史学史上第一次对“史学”提出若干概念并结合各种史书进行论述的理论著作，唐宋以下迄今，治史者不可不读。章学诚的《文史通义》也具有相类似的性质。章学诚多次讲到他撰《文史通义》的旨趣以及此书的意义。他说：“吾于史学，盖有天授，自信发凡起例，多为后世开山。”^[7]这是他自己学术的总的估计。关于《文史通义》，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

鄙著《通义》之书，诸知己者许其可与论文，不知中多有为之言，不尽为文史计者，关于身世有所枵触，发愤而笔于书。尝谓百年而后，有能许《通义》文辞与老杜歌诗同其沉郁，是仆身后之桓谭也。《通义》中有《言公》、《说林》诸篇，十余年前旧稿，今急取订正付刊，非市文也，盖以颓风日甚，学者相与离跋攘臂于桎梏之间，纷争门户，势将不可已也。得吾说而通之，或有以开其积棘，靖其噬毒，而由坦易以进窥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也，或于风俗人心不无小补欤！^[8]

章学诚的这一段话讲得十分坦率，他不独以学术上的独立见解自许，而且还极为关注当时的世风和学风，认为他的《文史通义》或许可以有补于“风俗人心”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惟其如此，这位史学家的内心世界也就袒露在人们面前，使后人读到这些文字，也会想见其风范而肃然起敬。值得注意的是，章学诚自信后人必有推许其书之人，除上文有所表露外，他还认为：《文史通义》的《言公》（上中下）、《诗教》（上下）诸篇，“其言实有开凿鸿蒙之功，立言家于是必将有取”^[9]。由于历史环境的原因，章学诚的著作在十九世纪较少有人关注，而到了二十世纪，他的著作受到胡适、梁启超的推崇，继而便彰彰于世了。

我之所以要对刘知几的《史通》和章学诚的《文史通义》作这样简要的论说，只是为了进一步揭示柳诒徵《国史要义》之所谓“踵蹶刘、章”的良苦用心与高远志向。

二、探索史学理论的体系

《史学要论》和《国史要义》都有自己的理论体系，反映了它们的作者在这方面的探索精神。由于话语和概念的差别，它们的体系也显示出各自的特色。

李大钊的《史学要论》是循着近代学科建设的要求和思路,探索历史学自身的理论体系。为此,作者首先提出了“什么是历史”和“什么是历史学”的问题,并阐明了它们的本质和区别。

什么是历史?李大钊写道:

历史这样东西,是人类生活的行程,是人类生活的联接,是人类生活的变迁,是人类生活的传演,是有生命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进步的东西,是发展的东西,是周流变动的东西;他不是些陈编,不是些故纸,不是僵石,不是枯骨,不是死的东西,不是印成呆板的東西。我们所研究的,应该是活的历史,不是死的历史;活的历史,只能在人的生活里去得,不能在故纸堆里去寻。

什么是活的历史,真的历史呢?简明一句话,历史就是人类生活并为其产物的文化。因为人类的生活并为其产物的文化,是进步的,发展的,常常变动的;所以换一句话,亦可以说历史就是社会的变革。这样说来,把人类的生活整个的纵着去看,便是历史;横着去看,便是生活。历史与社会,同其内容,同其实质,只是观察的方面不同罢了。^[10]

李大钊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认为历史就是社会,是实实在在的客观存在。历史和社会都是在运动着的,所以他特别强调地用了“活的历史”这个词。他概括地说:“我们所谓活的历史,不是些写的、纪的东西,乃是些进展的、行动的东西。”^[11]通观李大钊之阐述“什么是历史”的问题,可以看出,他是在认真地、科学地说明两种不同的历史的区别。他最后写道:

我们认识了这永续生存的历史,我们可以用几句最明了的话,说出什么是历史:

历史不是只纪过去事实的纪录,亦不是只纪过去的政治事实的纪录。历史是亘过去、现在、未来的整个的全人类生活。换句话说,历史是社会的变革。再换句话说,历史是在不断变革中的人生及为其产物的文化。那些只纪过去事实的纪录,必欲称之为历史,只能称为记述历史,决不是那生活的历史。^[12]

李大钊所指出的这种区别,在实质上是指出了客观的历史和人们主观所反映出来的历史,二者之间既有联系,又有明显的区别。历史研究之所以有巨大的魅力,这种联系和区别正是重要原因之一。

那么,什么是历史学呢?

李大钊从什么是历史出发,简要地回答过这个问题。他在讲到“历史和历史

学的关系”时曾这样写道：

以历史为中心,史学可分二部:记述历史;历史理论。记述的历史的目的,是欲确定各个零碎的历史事实,而以活现的手段描写出来,这是艺术的工作。历史理论的目的,是在把已经考察确定的零碎事实合而观之,以研究其间的因果关系的,这乃是科学的工作。^[13]

我认为作者在这里说的“艺术的工作”,是指历史编纂方面的工作;“科学的工作”,是指对历史编纂的内容作逻辑的分析和价值的判断。

在《史学要论》中,李大钊对“什么是历史学”作了详尽的阐述,他写道:

史学有一定的对象。对象为何?即是整个的人类生活,即是社会的变革,即是在不断的变革中的人类生活及为其产物的文化。换一句话说,历史学就是研究社会的变革的学问,即是研究在不断的变革中的人生及为其产物的文化的学问。^[14]

历史学“是研究社会的变革的学问”,这表明,历史是运动的,而历史学是研究历史运动的形式、轨迹和趋势的学问。

通过这些论述,李大钊把“历史”和“历史学”的联系和区别从理论上阐述得十分清楚了。在对“历史学”作了明确的界定后,《史学要论》依次论述了历史学的内部构成、外部位置及横向联系等三个问题。

所谓内部构成,即作者说的“历史学的系统”。作者认为,历史学包含“狭义的历史学”、“广义的历史学”(亦称“普通历史学”)和“最广义的历史学”,其内涵逐渐扩大。值得注意的是:在所谓“最广义的历史学”中,不仅包含了历史哲学,还包含了历史研究法和历史编纂法;而历史研究法和历史编纂法则更多地涉及历史学自身的有关范畴。这样一个逻辑体系,揭示了“历史学”的极其丰富的内涵^[15]。

所谓外部位置,即作者所说的“史学在科学中的位置”。作者以欧洲为例,阐述了“史学在欧洲中世以前,几乎全受神学的支配”,到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产生,“找出来的历史的根本理法”,使“历史学在科学上得有相当的位置。治史学者,亦得有法则可循”^[16]。

所谓横向联系,即作者所说的“史学与其相关学问间的关系”。作者认为,史学与较近的关系的学问,有六大类,而着重阐述史学与文学、史学与哲学、史学与社会学的关系,展现出史学应有之广阔视野。

《史学要论》的最后部分,论述了“现代史学的研究及于人生态度的影响”,认为史学的研究能培养起人们的科学的态度,从而具有“脚踏实地的人生观”;史学

的研究,还会使人们引出来“舜人亦人感奋兴起的情绪”,增强人们的社会责任感和对于历史前途的信心。^[17]

《史学要论》的结构大抵如此。现在来看《国史要义》的结构。《国史要义》以论史学的起源“史原”开篇,继之而论史职的权重(“史权”)、古代史学的核心思想正统论(“史统”)、史书内容的种种关联形式(“史联”),进而论述史家修养(“史德”、“史识”、“史义”、“史例”),最后阐说史学的社会功用(“史述”、“史化”)。现略作分析如下。

作者论史学的起源,认为:“史之初兴,由文字以记载。”^[18]这里的“史”似是指史书。作者据《周官》“史掌官书以赞治”的说法,认为“此为吾史专有之义。由赞治而有官书,有官书而有国史。视他国之史起于诗人,学者得之传闻,述其轶事者不同”^[19]。作者又根据《周官》关于“五史”即太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的记载,认为:“自《隋志》以来,溯吾史原,必本之周之五史。”^[20]因史官与周之五史有关,故史学“有一中心主干,为史法、史例所出,即是礼也”^[21]。作者总括而论之曰:“以史言史者之未识史原,坐以仪为礼也。”^[22]这是格外强调了以“礼”明“史”的重要。

关于史职权重的问题,作者认为:“吾国史家,艳称南、董。秉笔直书,史之权威莫尚焉。”^[23]这种“史权”,一方面是由于史官具有“共同必守之法”,如“君举必书”即是^[24]。一方面是“古史之职,书以谏王”^[25],这就是前面说的“掌官书以赞治”,其重要性非同寻常。因此,史官被认为是“社稷之臣”^[26]。作者指出:“后世史职,远逊于古矣。”^[27]

“史原”和“史权”两篇意在从史学的起源和史职的重要两个方面来说明史学是什么的问题。继而作者论述了史书的历史观点和对史事的处置问题,即“史统”和“史联”。作者认为:“史之所重在持正义。”^[28]他从“大一统”讲到“正史”,又讲到“持正统论”与“不持正统论”的关系和本质,指出:

自宋以来,持正统论与不持正统论者迭作。而传授之正,疆域之正,种族之正,道义之正,诸观念恒似蓄枘而不能相通。使四者皆备,则固人无异词,而史实所限,则必一一精析而后得当。骤视之似持论不同,切究之则固皆以正义为鹄也。^[29]

作者举王夫之与司马光相比较,指出:

王船山亦不持正统论者也。然生际明清之交,又丁元室之后,人力所穷,史实又异,而其孤怀宏识,又深病李髻等之局于一姓之私,则宁归之于治一乱,而不忍承认元、清之统一。故船山之不持正统论,与温

公相似而实不同。然其不持私己之偏辞，务求大公之通论，与温公之意，亦无不合。^[30]

“正统论”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自宋以后，在史书编纂上争论颇多，成为历史观点方面的一个突出问题。柳诒徵在考察了有关言论和史实后，提出了一个总的认识，他写道：

吾族由大一统而后有所谓正史，由正史而有所谓通史、集史。而编年与纪传之体虽分，要皆必按年纪录。虽史才之高下不同，而必持义之正，始足以经世而行远。当时之以偏私为正者，后史又从而正之。是即梁氏所谓统在国在众人也。明于三统五德之义，则天下为公，不私一姓，而前史之断断于一家传统者，非第今不必争，亦为昔所不取。而疆域之正，民族之正，道义之正，则治史者必先识前贤之论断，而后可以得治乱之总因。疆域不正则耻，民族不正则耻。^[31]

这些话，概括起来，就是“持义之正”。换言之，主“正义”是历史撰述中最重要的思想。

“史联”所论，至为重要。作者于此篇论述了史事、人物间本有联系，历史撰述如何反映这方面的种种联系，是治史的一大关键。作者指出：

史之为体，一时代有一时代之中心人物；而各方面与之联系，又各有其特色，或与之对抗，或为之赞助，而赞助者于武功、文事、内务、外交之关系又各不同。为史者若何而后可以表示此一中心？若何而后可以遍及各方面？则莫若纪、传、表、志之并列为宜矣。^[32]

作者进一步指出：“史之为义，人必有联，事必有联，空间有联，时间有联。纪、传、志、表之体之善，在于人、事、时、空在在可以表著其联络。”^[33]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从客观史事、人物之联系的存在，说到历史撰述如何反映此种联系的问题，这是涉及历史编纂学上的史书体裁的选择和史书体例的制定，自然这还直接关系到对历史资料的统筹和分配。作者强调“人事时空”都存在着联系，因而适当的重复不仅是不可避免的，甚至是完全必要的。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刘知几恰恰认为是纪传体史书的一个缺点，他批评《史记》记事“分在数篇，断续相离，前后屡出……此其所以为短也”^[34]。这就是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到客观事物本有种种联系，史家不可能在同一处把若干重要的联系都写到，更不用说都写得合理。人们从另一种观点来看，认为这种“前后屡出”的写法，恰恰能给读者一种联系，加强了对史事的理解和记忆。朱熹告诉学生们说：“《通鉴》难看，

不如看《史记》、《汉书》。《史记》、《汉书》事多贯穿，纪里也有，传里也有，表里也有，志里也有。《通鉴》是逐年事，逐年过了，更无讨头处。”^[35]不论从客观事物之间固有的联系来看，还是从读者便于阅读、易于理解来看，史书编纂上的这种合理的“重复”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必要的。“史联”所揭示的道理，是很重要的。

关于史家的修养，柳诒徵在《国史要义》中是着重加以论述的。作者论“史德”有深刻的见解：“言德不专为治史，而治史之必本于德。”^[36]这就是说，“德”是人们的普遍要求，而对“治史”者来说则为必备的要求。作者认为，从“史德”这一要求出发，“自史迁以降，史家所重，尤在实录”^[37]，应当说，这就是史德的优良传统。作者论史家的“史识”，从辨析刘知几、章学诚所论落笔，进而提出自己独立的见解，认为：“史事之去取有识，史事之位置亦有识。盖去取者为史之初步，而位置者为史之精心。”^[38]这里说的“去取”和“位置”，是选择和定位的问题，二者都重要，若“去取”失当，则“位置”便会大打折扣，故“初步”与“精心”也是相对的。作者还指出：“治史之识，非第欲明撰著之义法，尤须积之以求人群之原则。由历史而求人群之原理，近人谓之历史哲学。”^[39]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是指史家的撰述旨趣同历史发展之客观规律的关系。作者的这一认识，立意是很深刻的。作者之论“史义”，由孟子之论事、文、义引出^[40]，旁征博引，其要旨在于明公私而论历史与史学，他写道：“千古史迹之变迁，公私而已矣。公与私初非二物。只徇一身一家之计，不顾他人之私计，则为私；推其只徇一身一家之计之心，使任何人皆能便其一身一家之私计，则为公。故大公者，群私之总和。即《易·文言》所谓利者义之和也。由此推阐，公之中有私焉。相反相成，推迁无既。”^[41]看来，柳诒徵所说的“史义”不像章学诚所说的“史义”那样具有丰富的内涵，而历史的变迁、演进，似也不是“公私”可以概括的。不过，柳诒徵曾明确申言：“史义”以前的各篇，“无虑皆史义也”^[42]。然而这样一来，“史义”的含义又不免过于宽泛了。作者深意何在？似还可以探讨。作者论“史例”，有以下几个要点：一是关于史例的起源，认为“史例权舆《礼经》，计时已在《春秋》之前”。二是关于史例的类型，认为“史之为例，有去取焉，有差等焉，有联散焉，有序第焉；有片语之例，有全书之例，有编年与纪传相同之例，有二体独具之例”。三是关于史例之详，认为“史例之详”，以朱子所定《通鉴纲目凡例》为最。盖承《春秋三传》、《通鉴》诸史而集大成，所谓后起者易为功也。”四是关于官修史书尤应重视史例，认为“官局修史，杂出众手，要亦必有共循之例。”^[43]作者对史例能做出这些具体分析，在历史编纂学上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国史要义》最后两篇“史术”和“史化”，都是阐述史学的社会功能。作者把

“史术”解释为“史学”，认为：“史术即史学，犹之经学亦曰经术，儒家之学亦曰儒术也。吾意史术通贯经术，为儒术之正宗，故以史术名篇。术即道也，为古今人所共由之道。”^[44]作者引证历史上人们以读史而获益的事迹，说明：“史学之益，自持身、涉世、谋国、用兵，为术多而且精，非徒记问撰著即可为史学也。”^[45]作者进而指出：“史术之正，在以道济天下，参赞位育，礼乐兵刑，经纬万端，非徒智效一官、行比一乡、德合一君、能征一国而已也。第人事之对待，安危存亡、祸福利害，亦演变而无穷。治史者必求其类例，以资鉴戒。则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又为史之术所最重者也。”^[46]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这里实际上是讲了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史学本身所具有的功能，二是读史者如何去理解和运用这种功能，三是治史者应当善于显示出史学的种种功能。这比以往讲史学功能者更加重了分析力和说服力。如果说“史术”是阐述史学的社会功能在一些具体方面的反映的话，那么作者是通过“史化”阐述历史传统对人们心理与精神的影响，其中也包括蕴含在史学中的那些历史传统对人们心理与精神的影响。作者认为：“任何国族之心习，皆其历史所陶铸，惟所因于天地人物者有殊，故演进各循其轨辙。”^[47]这里所说的，实质上是历史文化传统的教化作用，而这种历史文化传统同史学有极大的关系。

以上是《国史要义》的体系与主要内容，以及笔者的有关评论。

上文已经讲到，李著和柳著在概念、话语上的不同；这里还可看出二者在体系和内容的侧重上也有所不同。一言以蔽之，这是两种风格的史学理论体系，分别论之，各具特色；合而观之，启发尤多。

三、理论上的几点启示

重读《史学要论》和《国史要义》，从史学理论的探索和建设的视角来看待它们，评论它们，并把这种看待和评论同今天的史学理论建设联系起来，我们可以得到几点有益的启示。

启示之一。《史学要论》和《国史要义》在探索史学理论方面所选择的“路线”和模式并不一样，但其目的却是十分接近的，这可叫做“貌异而心同”^[48]。所谓“路线”相异，是指《史学要论》从当代史学出发，从一般意义上来探索史学理论问题；而《国史要义》是从中国古代史学出发，以总结和阐扬其关于史学的认识。所谓“模式”相异，是指《史学要论》和《国史要义》在体系上的差异，尽管它们所论在有些方面有相同或相近之处，但二者在结构上及论述的重点上毕竟有很明显的不同，这就是“貌异”。而《史学要论》和《国史要义》都以讨论“史学”为指归，都是力图建立起关于认识史学的思想体系，或者说力图建立起关于史学理论的体系，